

中国经济体制的新模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人民出版社



中国经济体制的新模式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论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封面设计：倪天煦

中国经济体制的新模式

ZHONGGUO JINGJI TIZHI DE XINMOSHI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论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印张 196,000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200,000

书号 4001·561 定价 1.25 元

前 言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五年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近几年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明确了我国的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各项经济活动必须自觉地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打破了我们过去在经济体制上形成的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从而为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制订了全面改革的蓝图。

毫无疑问，这个《决定》是我国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一个伟大创造，是一部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它不仅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且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和使改革沿着《决定》指引的方向前进，我们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努力学习《决定》，认真理解它的精神实质，不断地提

高自己的认识，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自觉地贯彻《决定》的精神，同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决定》的理解，务求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使我们的思想认识有一个质的飞跃。能否做到这点，可以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

本书是基于以上认识选编的，如在学习《决定》的过程中能对读者有所裨益，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编 者

目 录

前言	(1)
----------	-------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	郑洪庆 (1)
--------------------	-----------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	高尚全 (14)
---------------------	------------

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	林子力 (33)
-----------------	------------

自觉学习和运用价值规律	李忠凡 (51)
-------------------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竞争	李忠凡 (63)
----------------------	------------

只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能够富中国	金立佐 (71)
-----------------------	------------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和市场	曾国祥 (88)
---------------------	------------

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开发民间活力	金立佐 (108)
------------------------	-------------

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蒋一苇 (126)
--------------------------	-------------

政企关系与经济体制模式	王 琢 (151)
-------------------	-------------

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	郑洪庆 (184)
-----------------------	-------------

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 建立指导性	
------------------	--

计划体系	陶 力 (198)
------------	-------------

价格形成与价格改革	马 宾 (209)
-----------------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	
--------------	--

按劳分配模式	吴稼祥 (222)
--------------	-------------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迫切的战略任务·····	李志凡 (235)
我们的事业需要千百万新一代的	
经济人才·····	王仕元 (247)
充分发挥城市在组织经济活动中的	
中心作用·····	李梦白 (256)
总结经验, 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 ·····	李崇威 (276)
后记·····	(299)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

郑 洪 庆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表，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了深刻认识《决定》的伟大意义及其精神实质，按照《决定》指引的方向将改革卓有成效地向前推进，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过程及趋势作一番认真的思考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一）改革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二十世纪下半期我国政治生活中极其重大的事件。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将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体制为什么要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破除经济体制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实现国家强盛、民族振兴和人民的富裕幸福。这是十亿中国人民的

共同愿望，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素以勤劳智慧著称于世。在中世纪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国的经济、科技、文化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但是，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的稳固性、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上层建筑的完备性，严重窒息了中国社会前进的生机，使之长期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1776年问世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多次提到中国比当时欧洲任何地方更富裕，但同时又指出，中国农工发达、人烟稠密的情况和五百年前马克·波罗描述的情形并无多大变化。这表明中国社会几乎是停滞的。而这一时期，欧洲却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跃发展，并开始雄心勃勃地开拓世界市场。

当帝国主义列强用商品加炮舰猛轰中国大门的时候，颟顸昏聩的清代君臣们仍在做“天朝独尊”的幻梦，而不肯睁开眼睛看世界。尤其令人惊讶的是，鸦片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道光皇帝仍然不知道英国有多大、处于何方；朝廷之上，堂堂大学士甚至提出用“乌鸡白狗之血”御敌的主张！国柄操于这样一群废物的手中，中国怎能不衰败下去呢？

在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下，近代中国堕入了贫困屈辱的深渊。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沉痛地指出，中国人的生活，就是世界上最悲惨的生活。具有革命传统的中华民族不能甘心沦为任人宰割的三流国家，她的无数优秀儿女为救亡图存而前仆后继。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改革的浪潮、革命的风暴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们为什么能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美式装备的几百万军队？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共产党而唾弃国民党反动派？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共产党高举了革命的旗帜，集中代表了振兴中华、民富国强的愿望。

在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实现民族振兴的唯一途径，就是全力以赴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三十多年来，我们在生产建设上也确实取得了旧中国不可能有的长足进步。但是，毋庸讳言，这种进步同国家投入的巨额资金、人民付出的艰辛劳动是不相称的，同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更是不相称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能够取得本来可以取得的更大成就。这里除了政治动乱以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左”倾思想指导和某种外国模式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同生产力发展要求相违背的、死板僵化的经济体制。

这种体制以高度集权、政企职责不分、否定物质利益原则、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作用为特点，在实践中主要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以实物分配代替商品关系，企业被管得很死，经营好坏、劳动多少一样吃“大锅饭”。它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我国生产建设投入多、产出少，经济效益低下，科技进步缓慢的主要根源。显而易见，这种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如不坚决改革，中国经济就不可能腾飞，国家的落后面貌就不可能根本改观，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不能得到大的改善。

对原有体制的弊病，党和人民早有察觉，也力求摆脱外来模式的束缚，走一条中国自己的路。但是，由于我们的理论准备和实际经验不足，特别是“左”的错误在相当长的时期占了

主导地位，使我们没有能够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在许多方面甚至向不合理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我们的体制不仅具有苏联式集中型计划体制的弊端，而且带有某些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色彩。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改革的要求更被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压制下去。然而，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特别是在粉碎了“四人帮”，人们环顾世界，终于发现我们不但没有赶上先进国家，差距反而拉得更大的时候，改革的要求倍加强烈了。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党在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历史任务，在中国大地上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二）六年改革的简单回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重大突破。自五十年代末开始，农村一直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农民没有种地的自主权，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使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建国三十年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人口竟然还吃不饱肚子。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农民群众创造的、同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一经出现，就显示出不可遏止的强大生命力，从贫困山区很快推广到全国。农民一旦有了生产经营和产品分配的自主权，被压抑了多年的积极性便如火山迸发，使停滞凋蔽的农村经济在短时期内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粮食和经济作物连年丰收，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在此基础上，农村经济结构开始改变。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专业户和各

种经济联合体大批涌现。还有的农民组织起来，到城里开旅馆、办商店、承包建筑工程等等。世代代被束缚在小块土地上，单靠耕种为生的农民，一部分已离开土地，从事经济收益更高的事业。传统的自给性或半自给性的小农经济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经济和现代化农业转化，饱受生活贫困之苦的中国农民也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富裕起来，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新路子，正日益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城市经济比农村经济复杂得多，对国家财政的影响也比农村大得多，因此，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势必较农村困难。尽管如此，几年来城市改革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和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六个主要方面：

第一，针对原有体制下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企业缺乏动力与活力的主要弊病，改革首先从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入手。这对过去只是在企业上收下放中兜圈子，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从1979年开始，先后试行过利润留成、利润包干、亏损包干、承包租赁经营等等多种形式的以企业责、权、利统一为核心的经济责任制。最后确定全面实行利改税，把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企业依法纳税后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去年下半年已走出第一步，今年自十月一日开始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

第二，在所有制方面，纠正了过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限制集体经济、排斥个体经济的错误方针，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支持和鼓励城镇集体和个体经济的成长壮大。从1979年到1983年，全国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由一千六百多万增加

到二千七百多万；个体劳动者由十五万增加到二百多万。此外，还出现了各种经济联合体、股份公司和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新的经济形式。

第三，改革原有的封闭式、单渠道、多环节的流通体制，实行“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一些城市试行打破条块分割和批发层次的限制，将省二级批发站同市批发机构合并，成立开放式的工业品、农副产品贸易中心。城市普遍开放了集市贸易。工业品由过去的统购统销改为计划收购、订购、选购和代销等灵活多样的方式。计划分配商品有所减少，并且发展了生产企业自销、贸易货栈和联营商店等多条渠道，扩大了商品流通。

第四，改变过去单纯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管理经济的办法，开始注重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在价格方面，进行了农副产品收购价和部分工业品销售价的调整，放开了小商品的价格。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了国家定价、企业定价和自由价格三种形式，初步恢复了质量差价、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在信贷方面，明确了人民银行要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成立了工商银行。部分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国营企业的流动资金也改由银行统一管理，并试行了浮动利率和差别利率。在工资方面，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部分企业还试行了劳动合同制、浮动升级和自费工资改革。

第五，为了克服原体制下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封锁，积极探索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以城市或工业基地为依托，按照经济的内在联系，逐步形成条块结合、城乡结合、各具特色、纵横

交错的开放式经济区和经济网络。国务院先后批准了十个大城市实行计划单列，拥有省一级管理经济的权限。一百二十多个城市试行了市领导周围县的新体制。成立了上海经济区、山西能源基地和东北能源交通基地三个规划办公室，开始进行规划和协调工作。

第六，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开展国际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从1979年到1983年，进出口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4.6%，1983年已突破400亿美元。五年中利用外资达146亿美元。对福建、广东两省实行了特殊政策，扩大其外经外贸自主权。兴办了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四个经济特区。今年年初，又决定增加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特别行政区，为更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对外合作提供了宽广的舞台。外贸体制也已开始进行政企分开、进出口代理和工贸、技贸结合的改革，一个对外开放的新局面正在打开。

综上所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我国经济体制、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同苏联模式相比、同我们原有的体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几年，工农业生产加速发展，财政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城乡人民生活也有较大改善，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建国以来的最好形势，这一切，都是同改革密不可分的。

城市改革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起来看，受到的限制还比较多，步子迈得不够大。各种改革措施往往是局部的、不彻底的，现行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病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工商企业仍然缺少应有的活力。这种情况同当前整个改革的形势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首先,它和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需要极不适应。过去,由于农村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都很低,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量很有限,如今不同了。1983年全国粮食商品率已达24.4%,经济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的商品率则高达60%以上,专业户的商品率就更高。随着出售商品和劳务的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成倍提高。据抽样调查,1983年平均每一农民纯收入为309.8元,比1978年增长1.5倍。他们由只求温饱逐步转向购买中高档商品,如新老“三大件”等等。这就要求在城市为农副产品开拓更大的销售市场,并创造条件促使粮食尽快向肉、禽、蛋、奶转化。与此同时,要求城市向农村供应更多更好的工业消费品。不仅如此,由于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的大发展,以及落后的传统耕作方式变为较先进的现代耕作方式,农民对各种生产资料、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城市原有生产、流通体制是在城乡商品交换和其他经济联系不发达的情况下形成的,完全不能适应这种新形势。各地出现的“买难卖难”就是突出的反映。城乡经济本来是一个既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如果城市改革跟不上去,经济活不起来,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城市支援和带动农村的作用,不利于工业农业的协调发展和工农联盟的巩固加强,从而对国民经济全局产生消极影响。

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还是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和赶上世界性科技革命新潮流的迫切需要。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是我国开展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阵地;同时又是科学研究和推广应用科技成果的主要基地,应该而且有可能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和实现科技进步方面发挥

主导作用。但是，我们原有的过度集权的体制却捆住了企业的手脚、城市的手脚，事事都要层层审批，难以有所作为。尤其是缺少一种激发企业及劳动者的进取心和创新精神的机制，非常不利于推动企业实现技术进步和进入世界市场。这种体制如不坚决改革，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有效地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就会使我们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面前陷于被动，再次失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良机。

从城市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来看，现代城市具有工商业集中、资金力量雄厚、交通便利、信息灵通、科技教育事业发达等优越条件，是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1983年底对266个城市的统计，独立核算的全民、集体工业企业所拥有的固定资产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77%，职工占全国职工的80%，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5%，上交税利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8%。这清楚地表明，城市是我们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依托，是国家的主要财源。可是，由于城市经济体制严重不合理，使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受到压抑，蕴藏在城市中的巨大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加快城市改革，不仅是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已成为影响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及时地作出了将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战略决策，对改革的深入发展将起到无可估量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三)改革新阶段的主要特点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阐明了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为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规定了各项方针政策。自此，改革便进入了一个更加广泛深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它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改革有了系统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将更加自觉而卓有成效地进行。

国际国内的经验都证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特别是怎样认识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体制模式，更具有决定性影响。由于“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具体论述作了简单化、教条式理解，过去长时期内，我们一直把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立起来，对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有很大的保留。在“左”的错误泛滥的时期，更是把商品经济和与之相联系的经济范畴，如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竞争、利润等等，统统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这是我国形成一种单纯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排斥价值规律作用的集中型计划体制的重要原因。粉碎“四人帮”以后，理论界虽然多次对这种错误理论发起冲击，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但是，认识始终没有取得一致，一些理论上的“禁区”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反映在改革实践中，就是某些方面缺乏坚定性、彻底